

# 将世界观带回国际关系

## ——评《天涯咫尺的国际关系》

曾向红

**内容提要** 世界观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国际关系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国内外学术界对此还缺乏充分的意识。本文从世界观的概念入手,在分析世界观与文化、宇宙论、本体论这三个相近概念的关系的基础上,对后殖民主义学者马歇尔·贝尔的《天涯咫尺的国际关系》一书关于世界观与国际关系知识的主要观点、启示与缺陷进行了重点考察,并对将世界观带回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世界观 国际关系知识 马歇尔·贝尔

### 一、引言

所谓世界观,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理解,是指“人们对于世界总体的看法,包括人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亦称宇宙观,它是自然

---

《国际政治科学》2010/3(总第23期),第96—109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审美观、科学观等的总和。哲学是它的表现形式。”<sup>1</sup>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世界观相当于宇宙观(也被称为宇宙论)。<sup>④</sup> 世界观是文化的一部分,相当于人们所说的文化理念价值或生活世界的思想行为层次。<sup>(四)</sup> 世界观或宇宙论与秩序问题密切相关,<sup>1/4</sup> 其特征是独特的世界秩序方案和对世界的整体看法。<sup>1/2</sup> 世界观不等于本体论。<sup>1/4</sup> 从同一种世界观或宇宙论出发,可以产生多种本体论。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日益自觉地去挖掘传统思想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启示。然而,一个很少被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现有国际关系研究中,世界观与国际关系实践(理论也是实践的一种<sup>⑤</sup>)之间的关系很少得到系统阐述?多数研究都没有明确地将世界观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议题。<sup>(4)</sup> 在这一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后殖民主义国际关系学者 J 马歇尔·贝尔(J. Marshall Beier)。贝尔明确讨论了世界观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作用,并对世界观与国际

<sup>1</sup>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10 页。

<sup>④</sup> 参见张志刚:《宗教学研究:当代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罗宾·G. 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柯映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肖巍:《宇宙学的人文视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温纯如:《认知、逻辑与价值: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sup>(四)</sup> 相关讨论可参考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年版;苏国勋:《社会理论与当代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sup>1/4</sup> 麦科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 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刘珩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郝大维、安乐哲:《期望中国:对中西文化的哲学思考》(施忠连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5 年版;莱米·布拉格:《世界的智慧:西方思想中人类宇宙观的演化》(梁卿、夏金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sup>1/2</sup> 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 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类学理论实践》,第 219 页。

<sup>1/4</sup> Martin Griffiths, “Worldviews and IR Theory: Conquest or Coexistence?” in Martin Griffiths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Taylor & Routledge 2007), p. 2

<sup>⑤</sup> 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活动本来就是一项专门的实践活动;其次,理论研究虽然是思想层面的活动,但这些活动产生的成果一旦为人们所接受,并用以指导人们的具体实践,它们也就间接地塑造世界。

<sup>(4)</sup> 限于篇幅,这里不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罗列,仅举两例:Ralph Pettman, *Reason, Culture and Religion: The Metaphysic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 2008 年版,尤见第二卷上部《帝国与国家》。

关系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具特色的论述。可以说,他是将世界观带回国际关系的开拓者。贝尔的研究尽管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但至少能让人们注意到世界观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本文对他的主要观点、有待继续探索的问题,及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可能具有的启示作一介绍,以期引起人们对该问题的重视。

## 二、贝尔对国际关系知识中霸权世界观的批判

贝尔对世界观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关系做了开创性的研究。贝尔是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政治学系的助理教授,他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将土著人等少数群体的声音带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并考察它们对于研究世界政治的启示。<sup>1</sup> 2005年出版并在2009年再版的《天涯咫尺的国际关系:本土性、宇宙论<sup>④</sup>与国际理论的限制》(下文简称《天涯咫尺》)一书,就是他这种研究取向的集中体现。<sup>④</sup>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界涌现了一大批对知识与权力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成果,但很少有人在世界观与国际关系知识之间建立联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贝尔的著作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下文分两部分对《天涯咫尺》一书进行介绍。第一部分概括他的基本观点,第二部分介绍他对世界观与国际关系知识之间关系的论述。

### (一)《天涯咫尺》一书的基本观点

《天涯咫尺》一书提出以下问题:包括国际关系知识在内的社会知识与殖民主义之间有何关系?针对知识主要由西方国家生产这一事实,贝尔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一种霸权式独白的现象。这是指在国际关系中,由于西方

<sup>1</sup> 贝尔个人主页: <http://www.socsci.mcmaster.ca/polisci/Websites/Staff/jmarshallbeier.html>

<sup>④</sup> 贝尔主要使用了宇宙论这一概念,然而在他的著作中也经常使用世界观这一术语,因此实际上是在这两个概念之间进行互换。

<sup>④</sup> J Marshall Bei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ommon Places: Indigeneity, Cosmology, 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Uncommon Place一词可译为“非共通的地方”。但贝尔强调,土著世界观与霸权世界观之间有着彼此依存、互为前提的关系,因此笔者将其译成“天涯咫尺”。

国家在物质权力与知识生产上的强势地位,这些国家在国际关系话语领域享有一种自说自话、而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土著人的声音置若罔闻的特权。<sup>1</sup>霸权式独白所说的内容基本上是西方社会的问题、知识或观念,对于西方人来说,由于已经沉淀为集体无意识或科学无意识,它们构成常识,而且被视为跨历史、跨文化的常识。霸权式独白意识不到的是,在西方社会背景中视为常识的东西,对于拥有不同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人们来说,往往是难以想象的。贝尔指出,美国国际关系学通过各种方式内化,使殖民主义成为可能的表象,但该学科对土著人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关切。<sup>④</sup>贝尔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知识属于高级殖民主义的范畴,曾经参与并且仍然介入到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人们与土著人的殖民事业当中。与那种以武力统治和暴力征服为特征的殖民主义不同,高级殖民主义是通过知识、范畴、世界观、观念、呈现等理念因素的运作和传播实现的。这同样是一种向弱势群体施加的暴力,贝尔称之为呈现暴力、挪用暴力、归化暴力或抹除暴力等。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将土著人对自身的描述或呈现、他们的世界观建构成不合法、无效的,而与此相对,西方知识与世界观的有效性是不言自明、理所当然的。

霸权式独白之所以能够维持,在于它能够得到霸权世界观的保证。贝尔认为,霸权式独白或高级殖民主义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将西方世界观或宇宙论遮蔽起来,并在学科建制中确立起自身的合法性,西方国际关系知识在已有的世界观框架内进行诠释循环,全然不顾是否存在有别于西方世界观的其他世界观。<sup>④</sup>由于掌握着裁定知识是否合法、有效的权力,并通过看似客观、中立的国际关系知识的传播,现代西方世界观向那些拥有不同世界观的人们实施了一种宇宙论帝国主义,它构成一种未经批判就被人们接受或被强制施加的霸权世界观。霸权世界观的政治与伦理后果在于:一方面,它严重限制了人们对世界发展的想象,妨碍普遍解放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霸权世界观在确立自身合法性的过程中构建了一系列二元范畴,往往赋予他者以否定、消极、歪曲的意义,从而为社会世界中等级制、歧视性的社会关系赋予合法性。<sup>¼</sup>因此,贝尔强调,在

---

<sup>1</sup> Bel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ommon Places*, p. 2.

④ *Ibid.*, p. 2.

④④ *Ibid.*, p. 30.

¼ *Ibid.*, p. 47.

国际关系研究中,尤其在研究土著人或异文化时,必须对世界观的多样性保持警惕,要求“我们对隐含的或不被承认的关于宇宙的基本假定和观点做深入的反思,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对‘宇宙论承诺’进行批判性的审查”。<sup>1</sup> 在自己的研究中,贝尔尽量避免将西方国际关系知识简单地套用在弱势群体对世界的理解上,而主张一种责任伦理,致力于让霸权世界观倾听被其压制的世界观的声音并做出回应,最终实现不同世界观的平等交流。对以霸权世界观为核心的霸权式独白和高级殖民主义的揭露,构成《天涯咫尺》一书的核心主题。

《天涯咫尺》一书包括三大部分。除了引言,该书共有八章,由“责任”、“呈现”与“反思”三部分构成。第一章介绍该书的基本观点及几个核心概念,如霸权式独白、高级殖民主义、宇宙论帝国主义和霸权世界观等。“责任”部分由前四章组成,主要讨论国际关系的发展历史及其与相关学科,尤其是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贝尔将各种学科视为一种动态的实践,主张学科之间不应该划定固定的界限。他尤其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参考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便发现那些被霸权世界观压制、但对人们想象世界多种可能性具有重要价值的 worldview (第二章)。不过,在第三章中,贝尔也详细指出了人类学研究中以主、客二分为基本特征的“参与观察”研究方法的荒谬之处,因为这种研究带来的结果是人类学家将自身建构的范畴视为合法、有效的知识,而土著人自己的描述反倒成为不可理解、不可想象的东西。据此,在第四章中,贝尔考察了与西方世界观具有重大差异的拉高塔印第安人(Lakota Indian)的世界观,以及这种世界观在面临美国主流文化对其进行同化时的艰难处境。在“呈现”部分,贝尔首先对拉高塔印第安人在美国流行文化中的呈现状况进行了考察,发现尽管那些欣赏或借鉴拉高塔人文化的人们并不一定怀有恶意,但他们在呈现拉高塔人文化资源时,有意无意地沿袭了殖民主义时代对印第安人的看法,从而对他们进行了第二波征服。随后,贝尔对体现在现实主义、历史学等正统社会理论(第六章),包括女性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解放理论(第七章)中的世界观预设做了剖析,尽管前者坚持国际关系的冲突性质,而后面的各学派预设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美好生活目标,但它们在追求普适性的过程中,体现出同化其他世

---

<sup>1</sup> Bei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anny Places* p. 4.

界观的倾向。在结论即“反思”部分(第八章),贝尔呼吁人们将本来就构成霸权世界观自我一部分的土著人世界观纳入国际关系研究中,以实现各种世界观之间的平等对话,这对于人们想象世界的多种可能性大有裨益。显然,在理论立场上,贝尔属于罗伯特·基欧汉所称的反思主义阵营。<sup>1</sup> 贝尔虽然借鉴了许多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资源,但他更加认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立场,因为他明确认同后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人们、土著人等弱势群体的关怀。<sup>④</sup>

总体而言,对世界观与国际关系知识之间关系的考察,是贝尔最具原创性的贡献。这是因为,无论是殖民者对非殖民者的呈现实践,<sup>⑤</sup>还是将责任伦理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sup>⑥</sup>或者要求国际关系学科在内的社会科学对自身的科学无意识进行“反思”,<sup>⑦</sup>甚至西方世界观具有同化差异的内在冲动,<sup>⑧</sup>都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贝尔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提出霸权式独白和霸权世界观这两个概念(一定程度上还有“高级殖民主义”),他有效地将相关问题整合到一个研究框架中,对世界观霸权与西方国际关系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做了全新探讨。下文我们着重讨论他的这一贡献。

## (二) 贝尔对世界观与国际关系知识之间关系的考察

世界观到底如何对国际关系知识产生影响?西方世界观是怎样成为霸权世界观的?这种世界观又具有哪些预设或者说基本特征?世界观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本体论、认识论之间的关系如何?为什么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

<sup>1</sup> 罗伯特·基欧汉:《研究国际制度的两种方法》载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01—332页。

<sup>④</sup> Be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ommon Places* p. 42

<sup>⑤</sup> Roxanne Lynn Doty, *Imperial Encounters: Imperial Encounters,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North-South Relations* (Minnesota: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p>⑥</sup> Daniel Wamer *An Ethic of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 Anthony Burke, *Beyond Security, Ethics and Violence: War against the Oth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sup>⑦</sup>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明确主张社会学科应该进行自我反思,可参考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版。

<sup>⑧</sup> Naëen Inayatullah and David L. Blane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Dif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赵汀阳将这种消除差异的冲突称之为“异端思维”,请参考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第 79页。

是包括后结构主义、后现实主义在内的反思主义学派、以及致力于研究观念与文化等理念因素的建构主义都没有关注世界观？对于这些问题，贝尔都做了回答。<sup>1</sup> 对于相关观点，我们可以稍作总结。我们着重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国际关系知识与世界观之间的关系；西方世界观的预设及其上升为霸权世界观的途径；如何展开对霸权世界观的批判。

对于世界观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间的关系，贝尔认为，“作为一种关于宇宙的理论，宇宙论既规定了万物的本质，也规定万物的可能性”。<sup>④</sup> 它们一方面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又限制了这种可能性。由此可见，世界观是一种具有内在矛盾的东西。至于其在生活实践中的功用，世界观构成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手段，而且这种手段一旦习得和拥有，将在下意识或无意识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用贝尔的话来说，世界观往往让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世界观对事物的解释来处理日常事务。在知识生产中，所有国际关系理论都受到世界观的影响，后者为国际关系研究者提供多样化的本体论与知识论。如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在本体论方面，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坚持物质本体论，建构主义（主要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提出了理念本体论；在方法论层面，三者共同坚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而反思主义学派则主张诠释学方法，更为激进的学者则提出了方法论多元主义或方法论无政府主义的口号。<sup>⑤</sup> 在贝尔看来，这些不同的本体论与方法论都不过是从西方世界观衍生出来的。国际关系的主流研究纲领和反思主义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很少从宇宙论层面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质疑和批判，这是作为霸权世界观的现代西方世界观很少受到挑战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知识生产体系维持自身霸权地位的重要策略。<sup>¼</sup>

---

<sup>1</sup> 贝尔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比较集中，见 *Bei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ommon Places* pp. 44-48.

<sup>④</sup> *Ibid.*, p. 45.

<sup>⑤</sup> “认识论无政府主义”是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提出来的口号。参见保罗·菲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年版。

<sup>¼</sup> 他指出：“尽管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看似有着可观的多样性，然而它们都排斥从外部宇宙论衍生出来的可能性。宇宙论所确定的，是本体论与知识论的区域。各种争吵不休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深度上仅仅聚焦在本体论与知识论问题，在广度上则限制在被宇宙论预先决定了的问题系列之内，争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巧妙地使西方宇宙论逃逸出检视的范围。通过这些方式，西方宇宙论得以避免被严肃地审视，从而继续对知识的生产产生影响。”参见 *Bei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ommon Places* p. 45.

对于现代西方世界观的特殊性及其预设, 贝尔否认了西方世界观的普适性, 不讳言这种世界观的历史背景, 而且明确承认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在西方世界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通过揭开西方理论和世界观普遍性和中立性的虚假面具, 贝尔还原了它们的特殊性和历史性。贝尔认为, 现代西方世界观“上溯到古希腊、中承《圣经》文本, 下继现代的主导宇宙论承诺”,<sup>1</sup> 期间延续几千年, 然而它仍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现代西方世界观有两个基本预设: 不可通约的二元对立特征与线性发展的存在观、过程观。第一个特征体现在世界政治或国际关系理论中, 衍生出文明与野蛮 / 自然、男性与女性、自我与他者、无政府状态与权威或等级制、混乱与秩序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范畴。<sup>④</sup> 这些范畴不仅是不可通约的, 而且前者往往被赋予积极意义并否定和压制后者, 这在意义世界里和生活世界中产生了众多持久的矛盾与冲突。除了二元对立这一预设, 西方现代世界观的第二个预设就是线性发展的存在与过程观。这种预设或思维方式认为, 通过依靠人类理性, 人类社会就一定能实现进步, 并能达至一个光明的未来。在这种视野中, 人类社会的演进将遵循从低级向高级、从传统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路径, 而且后一阶段都是以克服前者、消灭前者为条件的。比如人类社会可以相应地被分为狩猎—采集阶段、农业—手工业阶段、工业—商业阶段, 而现在或未来将要超越这些阶段, 从而进入更加进步的时代。在第七章中, 贝尔对新自由制度主义、马克思主义、民主和平论中存在的目的论倾向及消除世界观差异的情形做了考察。

对于西方现代世界观的霸权地位及成为霸权世界观的方式, 贝尔认为, 西方世界观属于高级殖民主义的一种重要形式, 是殖民主义的理念维度<sup>⑤</sup>, 它极大地影响到了第三世界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对世界观的坚持。贝尔认为, 霸权世界观是与武力征服和暴力统治相伴随的, 而且为这种征服和统治提供了合法性。通过歪曲呈现土著人和被征服者, 通过学科建制赋予这些成果以合法性——尤其是那些专门记录和研究的被征服者生活状态和世界观的人类学知识——西方学者们可以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再生产, 一般不会对知识

<sup>1</sup> 参见 Bei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ommon Places* p. 44

<sup>④</sup> 对诸如此类二元对立范畴的深刻解构可参考 R. B. J. Walker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sup>⑤</sup> Bei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ommon Places* p. 4.



或理论的真伪进行反思。如现实主义者借鉴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作为理论建构的根基,孰不知这是霍布斯利用地理大发现时代到达美洲的传教士、冒险家、商人、士兵的游记而虚构出来一种人类生活状态。<sup>1</sup>而对于被征服者来说,由于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空间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发现自身提供的知识不被殖民者和西方研究者承认,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为了争取承认而进行斗争,从而带来自身地位的进一步边缘化;要么接受殖民者等级制、歧视性的认知范畴和分类图式,从而实现自身的同化。这就是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研究欧洲人征服美洲过程用以处理差异的双重运动手法:差异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同化。<sup>④</sup>当西方世界观在内、外都取得了合法性,它自然也就上升为霸权世界观。

为了丰富人们有关世界的想象,需要对国际关系知识背后的霸权世界观进行批判。贝尔认为,对国际关系知识有不同批判层次,并对应不同的批判战略。对国际关系的批判可指向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对国际关系现象世界的批判,比如对全球权力、财富分配不公所带来的不正义现象进行揭露;第二个层次是对国际关系科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特定理论学派进行批判,如三大主流理论彼此之间的争论,以及反思主义对理性主义学派的解构;最高层次也是最少进行的批判,就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国际关系知识赖以建立的世界观。<sup>⑤</sup>就理论研究而言,即使是后结构主义、后现实主义等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持有强烈质疑态度的反思主义学派,其主要目标仍然在于争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权,它们所批判的不过是霸权话语而不是霸权世界观。反思主义虽然矛头锋利、语言激烈,然而它们依然嵌于现代西方世界观中。贝尔将前两个层次的批判称之为内部批判,与之相对的,是从他者世界观出发所做的批判,即外生宇宙论的批判。这两种批判与贝尔所说的两种反抗世界观霸权的战略密切相联。对应内部批判的战略是反对霸权的理论,这是一种对弱势群体地位、处境表示同情的理论;而对应于外生宇宙论批判的战略是反抗霸权的理论,也就是移情理论,即通过

---

<sup>1</sup> Bel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ertain Places* p. 157.

<sup>④</sup> Tzvetan Todorov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The Question of the Other* (New York: Harper Torch 1992), p. 42.

<sup>⑤</sup> Bel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ertain Places* p. 44.

被霸权压制的他者的眼光来反抗霸权。<sup>1</sup> 贝尔认为,前一种战略由于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述他者,而且受到研究领域宰制性知识体系的束缚,无法从根本上对霸权世界观进行批判;只有建立起反抗霸权的理论,才能让他者世界观所带来的崭新视域和思维空间得以开辟出来,这也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然途径。

通过研究世界观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一鲜受关注的问题,贝尔让人们意识到世界观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重要意义,这种努力是值得高度肯定的。这也是《天涯咫尺》一书最大的贡献。当然,除了研究主题的创新,贝尔取得的另外一个重大突破是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所作的探索。通过回顾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这几个主要学科与高级殖民主义的关系,贝尔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必须关注人类学研究成果,并要求国际关系学生更多地接受民族志研究方法即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的训练,但贝尔对参与观察持一种强烈批判态度。贝尔认为这种训练将帮助学生拓宽研究视野,发现观察、理解世界的多种可能,同时也能区分何谓好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与差的研究成果,避免不加批判地接受那些很有可能与高级殖民主义存在共谋关系的知识。就此而言,《天涯咫尺》不仅体现出其理论价值,而且还对我们如何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一定的伦理要求。

### 三、贝尔研究中有待拓展的问题

诚如贝尔自己所言,他所做的研究就是要走出促进不同世界观进行平等对话的第一步。也就是说,他承认了自身的努力很有可能存在缺失,需要加以拓展。在此基础上,笔者归纳出贝尔研究中存在的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或不足:

(1) 贝尔没有涉及到世界观所具有确认身份认同的作用。无论世界观是作为理解世界的便利工具,还是为理论研究提供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资源,都只体现了世界观的“工具性”作用,而没有触及到研究者或普通大众对其的情感

---

<sup>1</sup> Bei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ommon Places* p. 46

依恋和忠诚。而后者正是世界观的崩溃之所以能够激发出人们强烈情感反应、甚至引起国家间冲突与战争的重要原因。<sup>1</sup>

(2) 贝尔并未明确指出他所说的两个预设外,西方世界观是否具有其他预设。如果将对世界秩序的独特看法视为世界观的界定性特征,那么西方世界观就至少包括了另外一个预设,那就是主张通过消除混沌或无政府状态以实现秩序的目的论取向,而且这一预设比贝尔所考察的前两个预设更为根本。<sup>④</sup>事实上,在考察拉高塔印第安人宇宙论的独特性时,贝尔就是从这一角度切入的。

(3) 贝尔并没有提及在西方世界观与拉高塔印第安人世界观之间具有很大差别的同时,它们之间是否也存在某些可以通约的地方。即使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也有可能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存在相似或相近之处。然而在介绍这两种世界观的过程中,我们只看到贝尔对彼此之间差异的强调,体现出固化二元对立这一西方世界观预设的倾向。

(4) 贝尔的理论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批判的层面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规范内涵),很少对世界观在具体国际关系实践中的意义展开研究,包括由世界观的差异引发国际冲突产生的演变过程、内在机理、应对措施等问题。即使在论及美国征服印第安人的过程中,贝尔涉及的只是前者对后者世界观的破坏,并未深入讨论世界观间的差异给双方冲突带来的具体效应,从而无法为国家处理世界观间的差异提供更多启示。

(5) 贝尔提到世界观往往是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然而对人们为什么会不假思索地接受世界观预设的原因,贝尔并未细究。在这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关传统构成人类行为动机之一的观点值得重视,也就是说,世界观很有可能是人们出于习惯的原因而将其视为不言自明的道理。<sup>(四)</sup>如

---

<sup>1</sup> 而基欧汉与戈尔茨坦则指出了这一点,见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第8—9页。

<sup>④</sup> 这一预设反映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就是国际关系学者为解决“无政府状态问题”所进行的前赴后继的探索,可参考Richard K. Ashley, “Untying the Sovereign State: A Double Reading of the Anarchy Problematic”,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2, pp. 227-262; 也可参考Brian C. Schmidt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 A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ban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sup>(四)</sup> 韦伯来讨论了有关人类社会行为的动机时,指出了四类行为类型,它们分别由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情绪、传统四种因素驱动,可参考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6页。但由“传统”驱动的行为类型在国际关系中的研究尚未系统展开。

果果真如此,那么国际关系学者仅仅用工具理性(现实主义)、价值理性(自由制度主义)、共有文化(建构主义)来解释国际关系现象就是不充分的。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由传统驱动的行为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及由此衍生的其他问题。

(6) 贝尔为反抗霸权世界观提供的战略是有问题的。尽管贝尔主张各种世界观应该平等对话,然而,移情理论视野中的交流仍然是不平等的,因为本土世界观的平等地位无法得到保证。正如贝尔自己所承认的,只要霸权世界观不愿向前者赋权,而本土世界观又不能有效地自我赋权,那么平等交流仅是个梦想。<sup>1</sup> 此外,贝尔主张的移情战略,仍然是通过他者的眼睛看世界,<sup>④</sup>而非让他者自身看世界,土著人与本土世界观的主体地位仍然是悬置的。

值得指出的是,反思贝尔论述中的缺陷并非吹毛求疵。事实上,上文提到的这些问题不是贝尔一本著作能够解决的,我们要做的就是 在贝尔研究的基础上推进这些问题的研究,真正让世界 观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诚如贝尔所说,尽管推动不同世界观进行平等对话的愿望或许只是个梦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这种可能性保持开放,而不是任由霸权世界观主导人们的心智,对世界可能成为一个同一性帝国的前景无动于衷。<sup>(四)</sup>

#### 四、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相关性

将世界观带回国际关系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经过多年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确立起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国际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sup>¼</sup>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认国际关系学者为了促进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所作的诸多努力,笔者的本意在于促使人们去关注、去讨论、去研究中国延续了五千多年的世界观是否、以及如何为我们的国际

<sup>1</sup> Bel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Uncommon Places*, p. 220

<sup>④</sup> *Ibidi*, p. 46

<sup>(四)</sup> James Tully, *Strange Multiplicity: Constitutionalism in an Age of Divers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up>¼</sup> 对关于是否有必要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争论所做的总结性评论,可参考石斌:《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化”的论争》载王逸舟、袁正清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9—545页;王军、但兴悟著:《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1—368页。

关系研究提供启示和养分。事实上,自现代中西方接触、导致中国人丧失对传统世界观的信心以来,<sup>1</sup>如何重新确立起一种新的世界观,始终是困扰中国人的重要问题。如果说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需要界定一个核心问题的话,<sup>④</sup>从近代至今,如何在参与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无疑具备构成核心问题的资格。随着中国国家实力——主要是物质实力——的日益强大,中国面对国际社会要求明确表达自身以及对世界发展方向看法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sup>④</sup>而我们的这种能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形成可以向国民、国际社会清晰地传达对自身、对未来世界秩序看法的世界观。当中国领导人于2005年9月宣布将和谐世界观作为中国对世界未来秩序的展望时,许多人以西方理想主义关于“利益和谐”的观念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击得粉碎的事例,或者和谐世界观还没有充分学理化为由,认为它不过是中国人提出的一种“战略口号”。<sup>④</sup>如果我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言必称三大主义,<sup>⑤</sup>那么不仅看不到和谐世界观所具有的意义,而且是在与霸权世界观进行“共谋”,因为霸权世界观的预设已经内化了我们的学科无意识,除了套用西方理论来解释自身和世界,我们似乎就无话可说。作为中国人在传统文化基础上重建的一种世界观类型,和谐世界观的具体内涵、构想中的世界秩序能否生成、如何生成等问题,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sup>⑥</sup>而不应该根据从西方世界观预设中产生出来的知识或理论简单地予以否定。笔者认为,只有国际关系学者愿意付出努力,并密切结合中国传统世界观的丰富资源来进行研究,和谐世界观未尝不能实现学理化、未尝不能

---

<sup>1</sup> 相蓝欣对于这一问题作了简明扼要而又发人深省的论述,可参考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尤其是第一章“落后与挨打”的悖论。

<sup>④</sup> 关于理论的创新或建立需要一个核心问题的观点是秦亚青提出来的,可参考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

<sup>④</sup> 罗伯特·考克斯:《思考世界秩序的不同方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110—115页。

<sup>⑥</sup> 许少民就持这种看法,可参考许少民:《和谐世界:口号还是战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1085>

<sup>⑤</sup> 周方银、王子昌:《三大主义式论文可以休矣:论国际关系理论的运用与综合》,《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1期,第79—98页。

<sup>⑥</sup> 尹继武的文章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参见尹继武:《和谐世界秩序的可能: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56—65页。

为中国人据此提供自己对世界的想象和对全球现象的解释,这是一个自我赋权的过程——即章百家所说的“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是反抗霸权世界观并为之对话的前提。<sup>1</sup>

当我们把眼光越过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从世界观在国际关系具体实践中的意义这一角度看待和谐世界观提出的意义,我们发现它是嵌入在当代文化政治的框架中的。<sup>④</sup>所谓文化政治,即不同国家为了捍卫本国的生活世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自我认同等价值,将文化上升到政治的层面上,并与别的文化展开激烈斗争的现象。世界观是文化政治的重要内容。文化中的世界观,涉及的已不仅仅是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本体论和知识论等思想资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密切关系到我们如何做中国人、如何表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如何对自身的生活世界进行肯定与维护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和谐世界观这一从中国本土资源中生发出来的“世界图景”,尽管它仍然不完善。即使人们不一定完全认可这一世界观,我们也有义务去思索何种世界观能够对“中国这个复杂的现实存在”<sup>(四)</sup>以及未来的全球秩序做出合理、清晰、明确的表述。<sup>¼</sup>问题在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能否从霸权世界观及其预设中摆脱出来,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从而推动和谐世界观、天下观及其他可能的替代世界观的学理化和有效性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

<sup>1</sup>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

<sup>④</sup> 张旭东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详细、深入的研究。参见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sup>(四)</sup> 同上,第363—364页。

<sup>¼</sup> 这或许也可以说是对马凯硕“亚洲人能思考吗?”这一问题给出的中国人的答案。请参考 Mahbubani Kishore, *Can Asians Think?: Understanding the Divide between East and West* (Toronto: Key Porter Books 2001)。

## 作者简介

杨原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2010级博士生。2010年7月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yyi@163.com

孙学峰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1997和2000年在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分别获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6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合著,2007年)、《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合著,2005年)。

电子信箱: sunxuefeng@mails.tsinghua.edu.cn

包天民 (Jeremy Paltiel)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东亚政治和国际关系。最新著作为 *The Empire's New Clothes: Cultural Particularism and Universal Value in China's Quest for Global Status* (New York: Palgrave 2007)。

电子信箱: jpaltie@ccs.carleton.ca

石之瑜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兼任 *Political Science* (Wellington)、*Human Rights & Human Welfare* (Denver)编辑,著有《社会科学知识新论》《后现代的政治知识》《政治学的知识脉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当代政治学的新范畴》*Navigating Sovereignty: World Politics Lost in China*等。

电子信箱: cyshih@ntu.edu.tw

陈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政治学研究科联合培养双博士项目博士候选人。

电子信箱: chenzhengpku@gmail.com

曾向红 兰州大学讲师。2004年在长沙理工大学获交通工程专业学士学位,2007、2010年在兰州大学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lzxzyyj@yahoo.cn

李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2004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lizhuo1986@gmail.com